

JYIKANGDING
记忆康定

车过炉城

■ 蒋仲康

康人首次见识汽车，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。人背了汽车大卸八块的部件过大渡河吊桥，再组装完整，跑西平岗山路，还进不得城。那叫铁马。铁马不吃草，豪饮洋油，没奈何了烧杠炭为动力，似为奇谈。铁马来给自己修公路。

西康建省，雅康道初通，一辆福特，国字头川字尾九五号，披红领前，相续十几驾“道奇”成队，气派入炉城。炉城是撤了城东沿河一长溜家家户户半宅院为其开道的。汽车在当时是大劳力，比如给协康水电厂拉运大件器材，非它莫属。只是路烂，车跑不畅。以至于，省官开轿车出炉关后，轿车它得“坐”几十人共抬的大滑杆方能返程。

好在那会儿黄包车跑得欢，成二道桥路上一景观。人们泡水、乘车两玩儿，“新生活”运动引起的事。车夫偶尔也坐一拨别人拉的车，算是享受“本行福气”。

解放后，康定方完全实现汽车运输。长途货运强化，关外客运也成新鲜事。

重要的是康定汽车运输公司，辖汽车十七队、五十三队、六十四队，并客、货站各一。好长一段时期，驾驶员最吃香，随车携带些短缺生活用品获利，让人眼馋。由于根本没有短途客运，副驾驶位上捎坐搭车，成了驾驶员的俏，他们最认女娃子招手搭车。康定的世间女子都是“有点性格”的，就又把驾驶员们吃干榨净。

街上，除装卸车辆，是不行汽车的，没啥汽车可行。于是，马拉的重型胶轮大车，在炉城来过阵势。一旦上街，中杠骡子搽劲的高声长吠，骡马大驾几乎是横冲直闯。铃铃唧唧加赶马驾车的鞭响如炮，警路人小心。洗毛厂、肉联社都使过这非常马拉车。

瓦斯沟到东关，牛拉车成串，上街不便宜，都在东关外头停靠。说起来，是拉的多，使得拉菜的牛车也遭忌讳了。进城改挑挑，又担心候在城外的牛和车。

偏偏有人赶着黄牛拉起的木轮车，装个大水缸，沿街生水井子的水。不过，仅此一辆，这拉车的牛生得漂亮，车上水缸也干净。别的水车都是人拉。

先，早码头搬运工是锅庄亲属“内家女子”些，后来搬运女工持候汽车装卸。解放型的男当家不示弱，看好了铁轮汽胎车架车，自发组织，组织百多辆，拉车挣钱。闹得得欢。竟然由政府接收管理，当正经业务。出郊入城，中途途途运输，作用还大。拉土石砖瓦，拉柴草粮秣，活路忙不过来。三十六行，车架车为王。

车架车上坡，伴随主要劳力的家属在傍边拉飞蛾，特殊搭挡。吃力时，路人也都助上一臂之力，推车。无动于衷的，会遭白眼。哪像如今人是有别有用心的，还会惹祸。遇缘了，一辆车架车有十多人帮忙，车就轻快得飘了起来。松下劲，拉车的以笑还谢。

郊外下坡路段，车架车放“自动化”，人不拉车车带人。拉车真是在驾车，稳稳当当坐车前，以脚点地控制方向，越冲越猛，飞车不过如此。千八百公斤负荷，轻松过来，也没见出多大的安全问题，人的反应能力倒得以提高。

粮食关一过，平日子伙儿们，吃饱了撑的，在汽车队捺轴承，三枚造一辆滚珠车，巴到路面地皮走，碾碾振得山响。派上用场，为砖瓦石灰厂拉烧窑柴薪，康中校男生每星期天依此，名为劳动锻炼，实属找学费。甚者，真在贴家用。这发明让车队上技师们研究半天，才发现简单。眯眼就赞：只有弹子盘脑壳才想得出来。

炉城过车史，再就是“洋马儿”自行车。旧社会的“三枪”摆起，刹车不灵骑不得，唬人。文革中，“飞鸽”和“永久”基本普及。三转一响里的大型物件，比手表实用，捎个人携个货上路，功德。有街娃盯着几只铁环板头皮，妄图变出自行车来，未果。末了，把烂自行车轮圈当铁环，过自行车瘾。虽说普及，自行车还是缺俏货。

新时期，是车的天下，车的世界。某生意人打算购辆带斗的摩托，不小心实现的却是桑塔纳另加轻型货车一辆。炉城街上，火三轮散为过眼烟云。出门两步路也招手“打的”。时下各地已经是车满为患。路上因行车密集而拥堵，属常情。汽车时代，人开始成了车奴不是。真把车猛成“人类文明”，还得要人自己“文化程度”高点。



石渠草原上的民兵。(摄于1974年5月)

【老相册】· 龚伯勋



折多山垭口。

藏地八千里 曾经神往是新都桥

“哦呀，没办法，老牛就是喜欢吃嫩草！”小旅店多是妻子在打理。两个儿子，长得浓眉大眼，十分可爱，不停地吃零食，看样子自家小卖部的东西一半要被他们消耗掉。

黄昏时分，我坐在鲜花环绕的小院里，静静地看晚霞映红远处山顶。山色由红转黄，再一点点淡下去，慢慢地蒙上一层蓝灰色；灰色渐渐转深，又一缕缕染上黑色，越来越深，直到浓重的夜色覆盖整个大地，星月升上天空。

我曾多次路过新都桥。每次过路这里，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，他便是峨眉山佛教协会副会长通孝法师。

通孝法师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。1921年2月出生于四川射洪一个诗礼传家的殷实大户，十四岁那年偷偷到峨眉山太平寺出家，其间家人几次上山苦苦相劝，但始终没有说服他返回家乡。1936年，他到新都宝光寺受戒，随即入宝光寺佛学院学习，毕业后到重庆缙云山汉藏教理院深造。汉藏教理院是1932年秋，由中国佛学会主席太虚法师倡议，川军军阀刘湘等赞助兴办的四川第一所高等佛学教育学府，课程以藏文、佛学为主，兼授历史、地理、法律、农业、伦理、卫生等学科。三年后，通孝法师考取公费入藏学僧，在拉萨哲蚌寺依止多吉活佛深研藏传佛教经典，经十余年苦学精修，获得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高学位——格西学位，其师亲赐名“多吉尚祖”。

通孝结束藏地的学习，即取道返回峨眉眉山。途经雅江时，恰遇我十八军进藏。于是，精通藏汉语言的通孝主动为十八军做群众动员工作，劝告藏军放下武器。当地政府与部队首长见通孝在群众中颇有威信，几番动员他还俗，为新中国作出更大的贡献。经过一番思索，通孝终于答应。几年后，他又调到康定。

然而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通孝法师不幸受到冲击，蒙冤被关入位于新都桥的甘孜州监狱。

我曾采访过一些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蒙冤入狱的人，无不满腔愤慨，怨声载道，唯有通孝总是嘿嘿一笑，说出家人到哪里都一样。有时他还会露出孩子般的俏皮，告诉我在监狱里他如何为犯人争取权益，与看守积极配合管理等等。“犯人也是人，何况那个年代很多是受冤枉的好人！”末了他常会这样说一句。

2007年9月，通孝法师圆寂后不久的一天，我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，自称是法师的狱友，想跟我谈谈与法师在狱中的往事。我如约前往，只见一位须发全白的清瘦老人等候在那里。

“我是共产党员，参加过抗美援朝，还立功受奖。”老人一开口就表明了自己革命者的身份，以表示自己与监狱里某些无赖之徒有本质区别。“我是个性格刚烈的人，凡事不肯低头。”他说，就因为这份倔强，他在监狱里受尽磨难，直到认识通孝法师。“后来通孝法师来送饭，他一边给我喂饭，一边循循善诱开导我，甚至给我清洗身上的污物……”倔强的老人说到这里，喉结有些颤抖。他不停地强调，是通孝法师改变了他的的人生观，教他在逆境中学会了宽容与淡定。

当我问他在平反恢复工作后，是否曾设法营救通孝法师时，他摇摇头，说出一件更离奇的事。

那是通孝还在雅江为十八军做群众工作时的事情。有一天，通孝在牧场偶遇一个浑身泥土的放牛娃，遂停下脚招呼孩子走近，并替他灌顶。孩子家人对忽然而至的荣幸又惊又喜，不知所措。通孝说，这孩子将来必为大官，你们好好照顾他，最好让他读书。事后通孝也没将此事放在心上——每天都有许多事情要他处理——渐渐也就淡忘了。后来，法师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身陷囹圄，而当年这位放牛娃，竟然如法师所料，成为某省政府的一位高级干部。他一直在打听通孝法师的下落，只因不知道法师的汉名和详细情况，所以始终如大海捞针，没有结果。终于，皇天不负苦心人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，他终于找到通孝法师。法师终于跨

出监狱大门，当年的“放牛娃”将法师接到家里，献上了最隆重的礼遇。

1980年，通孝法师平反出狱，返回峨眉山。在他空空的行囊里，有一只小巧的酥油茶筒，凝聚着他对藏地几十年生活的感情。回到峨眉山后，他还时常打酥油茶喝，慢慢品咂，细细回味。峨眉山出产的上等绿茶全国闻名，但他对酥油茶就是情有独钟。一些新来的和尚觉得味道好，但又不敢向法师讨要，于是便估摸着法师打酥油茶的时间借故上门，以便蹭酥油茶喝。通孝法师心知肚明，但就是不点穿。想到这里，我不由赞叹：多么慈悲豁达的法师！这样的心胸，也许正是眼前这天高地阔的高原赋予他的吧！随后他又在峨眉山闭关三年，并在闭关期间写下很多心得笔记。他的师兄通老和尚一百一十岁在峨眉山圆寂，他的师弟通禅就是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。

起风了，我赶紧起身回屋，却发现，屋里充斥着塑料花、瓷砖、铝合金门窗等装饰。劣质的现代装饰材料与藏式传统石砌外表杂糅在一起，不伦不类，给人以强烈的不协调感，坐在屋里，竟让人有些不知身处何处的感觉。

回想十年前，也是这个季节，我们走过新都桥。刚到这里，天色突变，豌豆大的冰雹倾泻而下。金黄的杨树叶漫天飘零，落在地上，不时又被一阵旋风吹起，拉到空中，纷纷扬扬，如仙女散花。草场上淋得湿漉漉的绵羊拥挤着回家，不惧风雨的牦牛却不肯挪步，在溪水口与主人周旋，牧民们不断地嘘着气哨，挥舞长鞭。那情景至今历历在目。那时新都桥没有沥青公路，也没有外表漂亮的民居，但一切似乎与自然更为接近。如今乍一看似乎变化巨大，细心留心，却不难发现这些都是为旅游而有意打造的。原有的文化内涵已退化为符号，看似漂亮热闹，实则空洞乏味，就像民居中的劣质现代装饰材料一样，轻飘飘的，没有重量。

相比之下，我更怀念过去的新都桥，那时，她真不愧为“摄影家的天堂”。



新都桥民居。

作者深入藏区腹地，行游前藏与后藏，挑战极限路程，完美丈量青藏、川藏线。敬畏自然，尊重生命，质朴文字记录中的心灵洗礼；视觉盛宴，大美无言，原生态画面冲击你的审美极限。《藏地八千里》展现藏地的另一面，你所不知道的秘闻！

■ 徐杉 文/图

穿过五公里长的二郎山隧道，就进入甘孜藏族自治州辖下的泸定县。这里是进入藏区的第一个地理分界线，景色与潮湿多雾的四川盆地迥然不同：碧空如蓝，阳光灿烂，山峦起伏，水流奔腾，干燥而又清凉的空气中弥漫着野花草的清香。再往前四十多公里，就到达州府所在地康定城。

康定，藏语叫“达者都”，意为“三山相峙，两水交汇的地方”。古属牦牛国疆域。传说三国时诸葛亮在此铸箭，因称“打箭炉”或“炉城”。唐宋属吐蕃。清雍正七年置打箭炉厅，光绪三十四年（公元1908年）改设康定府。1939年建西康省，简称康，为中华民国延续清朝制度所设置的二十二省之一，1950年更名西康省藏族自治州，辖区主要为现在的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、阿坝藏族自治州、凉山彝族自治州、攀枝花市、雅安市及西藏东部昌都地区、林芝地区等，首府即在康定。五年后，西康自治区建制取消，康定划归四川省。

这是一座因茶马互市而繁荣起来的城市。在清末，这里已有几十家以茶为主要贸易品的锅庄。这是一座因《康定情歌》而声名远扬的城市。在这浪漫之地，随处可见彪悍粗犷的康巴汉子，一个个身着宽大的藏袍，足蹬牛皮长筒靴，头上盘着夹有红丝线的粗大辫子，不时策马从你身边经过，像极了古代的骑士。

康定城藏汉杂居，汉藏文化于此交融，不可分割。不少藏民喜欢穿汉衣服，麻辣川菜是当地最受欢迎的食物，而当地汉族也喜欢喝酥油茶，佩戴鲜艳的藏族饰品。

藏族几乎全民信仰藏传佛教。折多山上四周，山顶河谷到处飘扬着五色经幡，或者印以文字，或者绘以图案。经幡五色，依次是蓝、白、红、绿、黄，蓝色象征蓝天，白色象征白云，红色象征火焰，绿色象征绿水，黄色象征大地。五种颜色代表生命赖以存在的基础。世代生活在高原上的人们对大自然的变化尤其敏感，

故企盼大自然风调雨顺，人间太平幸福。佛教慰藉了他们的灵魂，经幡寄托了他们的希望。

离开康定城，汽车一路盘山而上，翻越海拔4218米的折多山。这是一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，翻过这里，才算真正跨入了青藏高原东部台地。当地人习称折多山为“炉关”，称山之东、山之西为“关内”、“关外”。折东关内藏汉杂居，商贸集中，文化多元，地理景观多为高山峡谷；关外则以藏族为主，以畜牧为业，高原草场绵延不绝，牛羊成群。

翻越折多山不久，就到达海拔3300多米的新都桥镇。新都桥位于河谷地带，水草丰茂，土地肥沃，四季景色各异，被称为“摄影家的天堂”，每年都有许多摄影爱好者远道而来。此时正值深秋，草色绿中带黄，从山顶到河谷渐次铺展开来。山坡上点缀着星星点点的牦牛和山羊，起伏的山峦在天边画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。到黄昏，斜阳如水，把山川河谷染成一片金黄。溪流潺潺，泛着耀眼的光芒。山间和路旁，金黄的杨树在地上洒上一层金色。成片的青稞也黄了，农夫们收割正忙，田间不时响起阵阵悠扬的歌声……

忽然，我被墙外一幢新建的藏家小旅店吸引——只见房前屋后开满了紫红、粉白的格桑花，以及硕大的粉红、深红的大丽菊，在阳光下娇艳欲滴，令人惊叹。走近才发现左邻右舍的院子里都种满了花，不但如此，窗台、屋顶也是鲜花盛开。这些花，并不像在内地的苗圃中那般，要经过一番精心的育苗、整枝、造型。它们天然自在，与野地里的茅草、山间的野花一样，当天寒地冻、风霜雨雪袭来时，便枯黄萎缩，生命似乎消失，可是一当春风掠过大地，它们就立刻复苏，充满野性地蓬勃生长。

男主人出来，热情地招呼我们住下。这人颇为健谈，而他的名字更是让人过耳不忘：革命。他的妻子叫尼玛措。比丈夫小十六岁。说起妻子，革命很是得意，大刺刺地对我们说：

花落水空流”是唐代诗人刘商《送王承甫》其一中的句子。相较白玉蟾的集句诗而言，吴师道这首青出于蓝胜于蓝。

含“劝君更尽一杯酒”集句而成的诗歌，还有清代章甫的《妆楼春夜宴集句》：“花有清香月有阴，长河渐落晓星沉。劝君更尽一杯酒，又典春尽半臂金。”第一句集自苏东坡《春宵》诗；第二句集自李商隐《嫦娥》诗；第三句集自王维《送元二使安西》；第四句集自黄莘田《闲居杂兴》组诗。今人吴文治也有一首《集句赠别》道：“五里青山十里溪，鹧鸪声里夕阳西。劝君更尽一杯酒，此别愁眉又复低。”第一句集自席佩兰《舟行春望》诗；第二句集自元好问《闻鹧鸪》诗；第三句集自王维《送元二使安西》；第四句集自苏曼殊《海上》组诗。

另外，“劝君更尽一杯酒”还有见于集句词中的情况。北宋郑少微《思故人·欲把长绳系日难》就多有集句组成。“欲把长绳系日难。纷纷从此

见花残。休将世事兼身事，须看人间比梦间。红烛继，艳歌阑。等闲留客却成欢。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赢得浮生半日闲。”上阙第三句和第四句集自韩愈《遣兴》诗：“断送一生惟有酒，寻思百计不如闲。莫忧世事兼身事，须看人间比梦间。”试将诗词对照，郑少微所集句子与韩愈诗歌不尽相同，莫砺锋先生认为郑少微词中“‘须看’之‘看’字，应正作‘著’字；‘须著’，犹言‘须把’也。”当然，不排除郑少微所集句子，有可能是韩愈诗歌异文的情况。下阙中“劝君更尽一杯酒”一句，集自王维《送元二使安西》：“赢得浮生半日闲”一句，则集自唐代诗人李涉《题鹤林寺僧舍》一诗：“因过竹院逢僧话，又得浮生半日闲。”只是郑少微把诗歌中的“又”字改成了“赢”字而已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“劝君更尽一杯酒”频频集句，在创作中也有被囿固套用的情况。王安石在《送吴显道南归》组诗之五中说：“劝君更尽一杯酒，明日路长山复山。”这是现在可考的“劝君更尽一杯酒”一句在创作中最早被套用的情形。王安石在送别朋友时劝他多喝一杯酒，因为别后天各一方，彼此再难见面。宋代诗法重《偶题一百三十三首》之七十二中说：“独能岗上，慧日峰前。云月是同，溪山各异。正法眼，破沙盆。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”全诗锋共八句，其中套用了“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”两句，似乎得来全不费工夫。

仔细考察不难看出，“劝君更尽一杯酒”一句多被人用于宴饮与送别集句中。一方面说明了这句诗深深契合人们的心理，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共鸣；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这句诗成了宴饮与送别场合的经典，人们无法回避它的存在。韩愈说“惟陈言之务去”。但在自出机杼的创作相形见绌的情况下，人们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奉行“拿来主义”。需要指出的是，在袭用时须确保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，使所集之作白璧无瑕，宛如新造。

■ 朱美禄

“渭城朝雨浥轻尘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”王维《送元二使安西》这首钱别诗，写景清丽如画，语言朴素自然，将朋友离别之际的惆怅与关切之情写得真挚感人。

此诗问世之后便被广泛接受。对这首诗的接受体现在音乐和文学两个方面。音乐方面的接受，指的是为诗歌谱曲以入乐传唱。据任半塘先生考证：“王维当时乃作诗之徒，非作歌辞，此诗人乐后，名《渭城曲》。”因诗中有“阳关”这一地名，所以《渭城曲》又被称为《阳关曲》；因其曲调有“三叠”结构，故又被称作《阳关三叠》。文学方面的接受，主要体现在以“劝君更尽一杯酒”入集句。尽管以入乐的方式接受和以集句的方式接受大有差异，但都反映了这首诗深入人心的事实，也有助于这首诗的经典化。

所谓集句，指的是凑集前人诗句以成篇什。关于集句的发明者，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认为是北宋王安石，袁枚在《随园诗话》中认定是西晋傅咸，意见颇不一致。但以“劝君更尽一杯酒”入集句，最早见于南宋诗人白玉蟾《集句赠王秀才》一诗：“富贵必从勤苦得，名位岂肯卑微休。劝君更尽一杯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。”“富贵必从勤苦得”一句集自杜甫的《柏学士茅屋》：“名位岂肯卑微休”一句集自杜甫的《徐卿二子歌》：“劝君更尽一杯酒”一句集自王维的《送元二使安西》：“与尔同销万古愁”一句集自李白的《将进酒》。诗歌虽由集句而成，却也自然流畅，不见拘牵补衲的痕迹。

元代吴师道有《集句一首赠潘季通》：“江上春风留客舟，鸟啼花落水空流。劝君更尽一杯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。”诗歌从思路上明显受到了白玉蟾的影响，只不过集句的来源不尽相同而已。“江上春风留客舟”是北宋方泽《武昌阻风》中的句子；“鸟啼